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西藏古文明中的 中原文化因素

石 硕 邹立波 黄 博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西藏古文明中的 中原文化因素

石 硕 邹立波 黄 博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石硕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3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7962 - 0

I. ①西… II. ①石… III. ①文化史 - 研究 - 西藏 - 古代
IV. ①K29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4450 号

·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著 者 / 石 硕 邹立波 黄 博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周志静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62 - 0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江蓝生

主 任 郝时远

副 主 任 晋保平

成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旦增伦珠 尕藏加 郝时远 何宗英

胡 岩 江蓝生 晋保平 刘晖春

马加力 石 硕 宋月华 苏发祥

许德存 (索南才让) 许广智 杨 群

扎 洛 张 云 仲布·次仁多杰

周伟洲 朱 玲

总 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 4000 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 7 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



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 1959 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开展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 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



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



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



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年12月北京

目 录

上编 石器时代 / 1

- 第一章 青藏高原旧石器中的华北文化因素 / 1
- 第二章 青藏高原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 / 9
- 第三章 西藏新石器遗址中来自黄河流域的
农作物品种——粟（小米） / 14
- 第四章 西藏卡若遗址中来自黄河上游的文化因素 / 20

下编 吐蕃时期 / 35

- 第五章 唐蕃文化交流背景：唐朝的入蕃汉人 / 35
- 第六章 唐代典章制度对吐蕃的影响 / 61
- 第七章 汉地宗教向吐蕃的传播 / 107
- 第八章 传入吐蕃的汉文典籍 / 155
- 第九章 从唐地传入吐蕃的物质文化 / 199
- 第十章 唐地传入吐蕃的历法、技艺及其他 / 269

参考文献 / 304

后 记 / 312

上编 石器时代

第一章 西藏高原旧石器中的华北文化因素

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被初步确定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地点共有八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①，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两个地点^②，日土县的扎布^③，普兰县的霍尔区，吉隆县的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④，阿里夏达措^⑤。尽管以上这些旧石器地点，其旧石器标本均为地面采集，缺乏原生地层证据，对其较准确年代的判定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根据这些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以及同周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进行比较之后，将它们确定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遗留大体没有问题。

考古学者在对西藏发现的这些旧石器进行初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西藏的旧石器明显地呈现出华北旧石器常见的一些特征。例如在石器类型上，西藏旧石器的石片石器占有较大数量，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石器工具有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和尖状器三种器形最为普遍，这些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另外，在藏北申扎、双湖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

①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第105~109页。

②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③ 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考古》1986年第4期。

④ 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15~21页。

⑤ 霍巍：《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



长刮器和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这些器形都同样出现在河北阳原虎头梁^①、山西沁水下川^②，以及宁夏水洞沟^③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所以，考古学者认为西藏旧石器文化的特征与华北旧石器传统相一致^④。

青藏高原旧石器为什么会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文化特征与技术传统，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关于这一问题，还得从2000年以来有关人类起源研究取得的重要突破谈起。

过去，曾流行过一个颇令人鼓舞的观点，青藏高原特别是作为其腹地的西藏极有可能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⑤。此观点曾对从事青藏高原史前及藏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产生过相当影响，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认识，甚至有学者还将青藏高原人类乃至藏族始祖人群直接或间接地追溯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元谋猿人^⑥。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在人类起源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过去有关人类起源所建立的传统认识体系开始受到严重冲击与挑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非大峡谷一系列有前后年代关系的人类起源实物证据的发现，特别是美国遗传学家瑞贝卡·卡恩（Rebecca L. Cann）和艾伦·威尔逊（Allen Wilson）将分子生物学技术运用于人类遗传多态性研究所得出的全新结论，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1987年卡恩和威尔逊等人发表了关于人类线粒体多样性的研究成果，首次从人类mtDNA多态性数据推断出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起源的时间，其简明的结论是：“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DNA，共同起源于一个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⑦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所找到的无论是

①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

② 王建、王向前、陈英哲：《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③ 贾兰坡、盖培、李炎贤：《水洞沟旧石器时代的新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8卷第1期。

④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⑤ 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⑥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44页。

⑦ [美] 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50页。



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爪哇人还是北京人都不是今天地球人类的始祖，他们的后裔没有能够延续下来，换言之，他们均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上遗传演化与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①。当今地球人类的真正祖先是晚期智人。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e）的直接祖先则是距今9万~22万年前（现常用15万年前作代表）同一位女祖宗（被喻为“夏娃”）的后代。他们当时是从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e）进化而来的一个东非的小群体，这个种群据估计当初的人口总数可能只在1万人以内，那时他们身上的mtDNA应还完全相同^②。

2000年，有关人类起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再次取得重要突破。以彼德·昂德希尔和彼德·欧芬纳为首的20余位科学家在《自然遗传学》杂志发表共同研究成果，这项大型研究成果根据对男性Y-染色体多态性研究，其结论不仅仍清晰地显示当今分布于世界各大陆的现代人均起源于非洲，而且对于人类起源及其迁徙时间得出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在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祖先是从小5万年前才开始由非洲向外迁徙，并逐渐散布于世界各地的。Y-染色体研究的重要价值还在于，科学家们根据世界各地Y-染色体谱系的分布图，还大体勾勒出了现代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大陆迁徙的路线与时间，根据其研究，现代人进入东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5万~3万年^③。

按照Y-染色体分布图所得出的结果，5万年前现代人由非洲迁入东亚主要走了南、北两条线路，对此，美国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

① 目前仍有少数科学家坚持“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否认东亚智人起源于非洲。对此，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阐述：“从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而且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到东亚的现代人和直立人之间，没有出现过交融的现象……”。近年，中国遗传学家金力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万2千名男性进行了取样，结果表明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因为每个人的Y-染色体中都有M168标记。对寻找东亚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一结果，至少对男性谱系，完全否定地区进化的理论。而东亚的线粒体DNA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几千份取样，结果全部显示他们的祖先在非洲。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直立人在现代东亚人的基因中留下了痕迹，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杜波斯的‘人猿’走进了进化的死胡同，他们完全被现代人替代了。”参见〔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0页。

② 瑞贝卡·卡恩的论文发表于*Nature*，1987，325，31。

③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1页。



下描述：

从基因图谱中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像一双“钳子”或“筷子”，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东亚定居。欧亚部落走的是北方路线，他们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由南西伯利亚的大草原进入东亚，而走南方路线的海上移民部落，他们迁徙的时间比欧亚部落要早，约在5万年前。今天东亚存在的谱系证明了古老的南—北区别。路卡·卡瓦利—斯福特曾和中国同行合作，对东亚人数十个非Y-染色体多态性进行了检测，他们发现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之中，比如北方的汉族人和南方的汉族人，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多的是地理上的，而不是民族上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部落的后代，几万年前两个部落从不同方向进入中国。今天，南北谱系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①

那么，按照现代人分南、北两路进入东亚之情形，西藏高原旧石器人群是从什么方向迁入的？他们是属于北方人群还是南方人群？对此，人类基因Y-染色体图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关于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迁徙的“欧亚部落”进入东亚的情形，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描述：

随着一些欧亚人沿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欧亚部落的另一些人沿着天山的方向，向东、向北迁徙，其中有些人很可能通过“准噶尔裂谷”（成吉思汗正是由此侵入中亚的），进入了现在的中国。大部分移民很有可能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我们现在有幸知道这一切，是因为这些移民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M175，这个标记只能在东亚找到，在西亚和欧洲完全没有。

今天，出现在欧亚M9谱系的M175标记，在韩国的比率高达30%。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它出现在大约3万5千年前，与朝鲜、

^① [美] 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1页。



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间相一致。……今天生活在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以东的大部分亚洲男人，他们的“配方”里都有 M175 标记，是它形成了东亚部落。^①

也就是说，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迁徙的欧亚部落实际上分成了三支：一支沿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一支向东可能是通过“准噶尔裂谷”（在今中国新疆）进入了中国，但人数较少；其中“大部分移民”即最主要的一支则是“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而进入东北亚并成为携带 M175 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这一支绕道经南西伯利亚南下的东亚主体人群可能是构成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的主要来源。而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的迁徙与扩散，可能正是造成西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出同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关于西藏旧石器与华北旧石器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还可由另一事实得到有力佐证。目前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共发现 5 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和地点，它们是：汉源富林遗址^②、汉源狮子山地点、攀枝花迴龙湾洞穴遗址、甘孜州炉霍县人牙化石和石制品地点、北川县人牙化石地点。这 5 处遗迹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均主要表现为小石器或细石器类型。而考古学者也普遍认为这些小石器类型明显是承袭了华北旧石器的小石器传统^④，故学者们据此推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 1 万 ~ 2 万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由黄河上游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川西高原），他们将源自华北的小石器或细石器传统带入了这一地区。他们当时主要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河流阶地、河谷盆地及洞穴地带，以狩猎一

① [美] 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 149 页。

②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 年第 1 期。

③ 其中炉霍县人牙化石和石制品地点因有原生地层层位，根据对出土动物骨化石所作碳 14 年代测定和对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种群判断，其年代在距今 1.1 万年左右。参见宗冠福、陈万勇、黄学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发现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材料》，《史前研究》1987 年第 3 期。

④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 年第 1 期。



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①。既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具有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由黄河上游甘青高原南迁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那么，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沿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向西进入西藏高原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以此背景而论，青藏高原旧石器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的相似的文化传统就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毫无疑问，青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可能揭示了一个事实：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的主体人群不仅属于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向东迁徙的“欧亚部落”，而且是欧亚部落中主流的一支即属于携带 M175 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他们进入西藏的路线乃是“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②而南下东北亚及华北大平原，再由华北平原向西迁移沿黄河上游进入青藏高原。正因为如此，才直接导致了西藏旧石器的面貌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及文化传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并不完全单一，也呈现出某些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尤其在西藏西部及西南部某些局部区域较为明显。例如，在西藏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标本，其总的特点是以砾石石器为主，少见石片石器，器形组合也以刮削器和砍器为主，不见尖状器，石器原料绝大部分为黑色板岩，均由扁平砾石加工而成^③。调查者认为，吉隆县旧石器标本呈现上述面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吉隆盆地的生态环境，也有别于青藏高原的其它各处旧石器地点”^④。也有学者认为，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标本与中国南方盛行的以砾石作为原料制造石器的旧石器传统之间存在联系，理由是：“在打片技术上以直接锤击法为主，工具以重型砍砸器为主，加工方法上不见棒击法的压制技术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从空间关系上讲，西藏的东北部紧邻四川盆

① 石硕：《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载《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叶茂林：《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载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② [美] 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49页。

③ 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15～21页。

④ 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17页。